

# 二十四桥仍在

## ——追忆我和马林帆的交情



作者近照

六十年岁月漫长吗？是的，多少曾经的人与事都已变得模糊不清。六十度春秋遥远吗？似乎也不，多少往事历历如在昨日，想忘也难，比如我们风雨泥泞中艰难同行的经历。何况有你字字力透纸背的书信在，有我一本一本未曾泛黄的日记在。言犹在耳，墨迹甫干。

### 人物春秋

#### 一

一声汽笛长鸣，列车出站，轰隆、轰隆，“富平——三原、三原——富平”……车窗外的雨也大起来，哗啦啦。我倚在硬座的靠背上，随意向外张望，一种无名的孤独感携着一丝凄凉向我袭来。眼睛的余光里似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，转过头来，当四目相对时两人几乎同时“诶”了一声。他是马林帆，初中同学，高我一级，虽然我们从未交过言，但我知道他爱写作；他知道我，大概是因为我有时会出现在学校的文艺舞台上。所以，瞬间脱口而出的那个“诶”的潜台词双方都明白：“你去年毕业后上了富平师范（后迁往高陵，改名高陵师范）？你今天是去上师范吗？”

#### 二

两颊十七岁的心就这么靠近了，在三原北上富平的列车上，在1956年的秋雨声中。同学两年，遇见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和阅览室。两人都不爱说话，开始还问“借什么书？”“今天看的啥？”后来干脆以点头、微笑打招呼。一次去阅览室的路上，他给我了一本伊萨姆夫斯基的《谈诗的技巧》，说这本书可以看看。书是作者的经验的谈，虽是译文，却很好读。但读后的感觉是诗这玩意儿得讲究巧和美，是文学里的俏佳人，一般人只可远观。



1980年10月，作者(右)和马林帆(左)在泾阳县文化馆

还书时他问：“怎么样？”我如实奉告：“书很好，也大体看得懂。只是书里举的例子我大多没读过，理解也就皮毛。我想，我恐怕先得多读点诗作品。”他回一声“是的”。那时，林帆大约既出于友好，有书便想与我分享，同时也借此探测一下我对诗的兴趣，所以听了我的回答以后便不再提诗的事。此后，仍然是点头、微笑，仍然是各自心中的同好者。写作上没有过深谈，但在秦腔乐队里却是真正的知音。秦腔伴奏的领导乐器是板胡，俗称“头把弦”。林帆是拉二胡的，他不喜欢跟另一位拉板胡的同学合作，愿意给我“供二胡”。其实，那位同学的指法比我熟练，只是像做学问不严谨一样，节奏有时不稳。林帆的二胡水平也不算很高，但弓法有力，手韵好，揉出的音有质感，加之节奏鲜明、掷地有声，很适合伴奏秦腔这种苍凉、激情的生命呐喊。每当板胡、二胡的高低音配合得恰到好处，两人便不免相视而会心一笑。

什么是知音？你知我知，甚至心照不宣，这就叫知音。再向前一步便是知心了。知音需要懂得，需要心有灵犀，而知心还需要相信，一种无需理由的兄弟般的信赖。一个仲夏的星夜，我毫无准备地邂逅了这种美好的情谊。我们一起在操场边的单杠架旁坐下来。“听说你跟王××谈恋爱？”他的话没有任何铺垫，我一语塞。“连你也惊动了，可见真是满城风雨了……”这是感叹，而非回答。眼前的夜，铺天盖地般笼罩着我。“什么惊动不惊动，不过风声的确很大，我想我应该知道实情了。”他不紧不慢，态度诚恳。

难为了她。我在班上负责排戏，要给她说话，教她唱腔板路，让她跟弦试唱，这么，说话自然也就多。她为人善良、厚道，学习认真，有疑难难爱跟我讨论……

说实话，她对我关心，我对她印象也好，如此而已。至于风声大，怎么说呢？一来，班上有几位无心于学业的老兄很乐意跟她搭讪攀谈，嬉皮笑脸，但她却不给面子，人家当然嫉恨。二来，女生中有一位尖酸刻薄者，她有本事从针尖大的窟窿里吹出碗口粗的风，他们两方面一配合，还不风雨大作！”

“好了，我明白了。我想知道，你觉得你俩这关系前景如何？听说她比你大，已有有夫之妇。”

“是的，她已经结婚，可这跟我有啥关系？我又不是跟人家谈婚。至于说前景，我也很茫然。噢，林帆，我想问你，男女之间能不能交朋友？我指的是那种亲如手足，或如姐妹，或兄妹、或姐弟而又不过越礼的纯情的真朋友？难道男女交往的终归都必须婚配吗？”

林帆抓住我的手腕，微微一握：“日乾，这个世界级的大问题，岂是你我能讨论清楚的。理论上似乎有答案，古人的主张是‘发乎情，止乎礼’，但现实世界其实是不允许的。”“那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“相信自己，把握自己。”他说得毫不含糊。君临人间的满天星斗，一定还记得1958年仲夏之夜那两心无猜的倾听与剖白吧。

分手五年不算太短，好友间却无一字还；四十里地不算太远，两人却一直不曾相见。大跃进烽火炙烤，三年饥荒的煎熬，清贫给个人问题带来的烦恼，因“特长”接踵

而来的干扰，整天在圈画错别字中打发时光……刚踏上艰难的人生路，彼此都有些自顾不暇了。

但对于文学总难忘情，孤身作战，根基太差，不免觉得无助。当年没有勇气与之深谈却早在心中引为文朋诗友的林帆呢？他比我爱得早、爱得深，这些年是跟我一样“两间余一卒，荷载独彷徨”呢，还是在积蓄力量蓄势待发？

一封“嚶鸣求友”的书信，1963年7月从高陵飞往泾阳。自称“凌乱的案头堆放着厚厚一叠亲友的来函，但懒于动笔回复”的老同学却例外地“扭开生锈的笔管”，一口气在十六开的信笺上写了五张：

有谁说，真挚的友情，乃是一掬甘美的清泉，馥郁，芬芳。说得是好。然而，如果用它来表述你我的友谊，似乎还嫌单薄。友谊之于你我，我想，即使借用一句精辟的比喻，抑或套用一句充满哲理的警句，也是很难说得明白的。我们之间友谊的基础，不是建立在眺着交错，灯红酒绿的宴席之上，也不是置放在使人神摇目眩、掷地作响的金元之中。它自有其纯洁和高尚的内容。要勉强给以概括的话，是否可以称作“文字建交，笔墨结缘”呢？——尽管你我并未打过多少文墨的交道。

肩负重荷的人，是难有文艺创作的。我的右肩扛着工作的重担，左肩背着家庭的包袱，用跑步赶着生路，哪来余裕容我构思，拼命啃书？

可是，我终究是和文字多少发生过一些机缘的人，就这么跟它轻易分手，总是不大休善的。创作的欲望，有时也如春芽萌发，有顶出地面之势；看到“同辈”或“后辈”无声的“挑战”，惭愧之余便是“着急”了；重振旗鼓吧，不能；就此诀别，又不愿……我就是徘徊在这么一个充满矛盾的十字路口，一筹莫展，进退两难。

感谢友情的支持，是你的来信燃点了我将熄灭的热情之火，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。“不在沉默中爆发，便在沉默中死亡”，岂能永远沉默不起，坐以待毙么？

——我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。失联的朋友有了回应，而且回应得如此响亮有力；“失恋”于文学的凄苦的心又振作起来，向着“在水一方”的“蒹葭伊人”不懈追求了。

然而，追索便要付出追索的代价，道阻且长，呕心沥血那是你自愿，可怕的依旧是“人言”。平常日子，人言不过是酸风妒雨，非常时期，人言会骤然升级为舌刀腹剑，虎啸猿啼。

有谁知道1966年暑期那个“教师集训会”吗？我想将来再细致的史书恐怕也不会有它的影子。“集训会”者，就是把中小学教师囚禁在某处，在工作组的主持下“大革文化的命”。那时的口号是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任何不“左”不“红”的人和事都可打“一切”，重点是“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”“校长们，以及我们这些遇事不会‘三缄其口’却又喜欢看书、爱动笔墨的小人物。读过《三家村札记》的，自然是‘小三家村’，欣赏秦牧《艺海拾贝》的便是‘封资修的崇拜者’；写给工人的《深夜寄语》明明是读《烈士诗抄》的感动，竟被‘上纲’为‘小资情调’，一则路遇某同事夹着口袋去借粮的日记，更成了‘攻击粮食政策的铁证’……

我在高陵挨批，林帆也在泾阳受罪。我

知道，他必然和校长一起被称作“黑帮”，因为刘校长爱才重才；他也必定有“恶毒攻击”之罪名，因为他曾公开发表过讽刺性漫画；不用问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他头上还会顶着个“地主阶级孝子贤孙”的覆盆大帽……

林帆其人，你可以强力摁他“低头”，却休想逼他“认罪”。但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，罗织株连，也同样是祖传套路。很快，泾阳方面的“革命派”来信催我回忆跟马林帆一起谈过的“黑话”，未达目的，又来声讨：“向你要马林帆的黑信，你不但给反而为他辩护”，“你们同流合污，难怪都是牛鬼蛇神！”

劫波过后化笑谈。我说：“林帆，你说咱俩两个牛鬼蛇神谁高？你虽然有‘帮’，又被封为‘二邓拓’，可我也曾被抬举为‘反动权威’呢！”他扑哧笑了，嘲弄夹着轻蔑：“中国的语言真够丰富的。”

不久，我由外县回到故土泾阳，林帆也从基层调到县文化馆。本该就有些声气相应的家伙经由猛烈的“革命洗礼”变得越发贴心而



1983年5月，作者(左)与马林帆(右)在延安清凉山摩崖前

从基层调到县文化馆。本该就有些声气相应的家伙经由猛烈的“革命洗礼”变得越发贴心而

从基层调到县文化馆。本该就有些声气相应的家伙经由猛烈的“革命洗礼”变得越发贴心而

正在筹办《陕西文艺》的省作协在兴平召开座谈会，他归来谈体会，也顺便转述雷抒雁听李瑛谈诗，共写了满满的九张。1982年6月，作协开会研讨陕西诗歌创作如何“突破”，他的“汇报”长达六页；借《乡恋》谈自己的学诗体会，他又一口气写了八张……而我那时，常常是从单位出发，蹬着自行车上西安，拜编辑、会文友，归途便走亲戚，往返二三百里，晚上便住在林帆处，说是为了歇脚，主要还是想和他聊聊我们钟情的文学。1972年10月



1957年，马林帆(后排右三侧身者)和冯日乾(后排右五)在高陵师范秦腔乐队

29日晚，两人“打对”睡着，聊至深夜。“睡吧！”拉灭开关。稍停，他又开口：“日乾，你说再过去若干年，谁还知道咱弟兄俩曾钻过一个被窝？我们自己那时候又会面对今日的痴迷作何感想呢？”

诗人的多情感慨逼我掏出一句直楞楞的回答：“苟富贵，勿相忘！”

他从鼻孔发出一声叹息，又像是自嘲：“我们这些苦楚的小人物会有什么‘富贵’之日呢？所求者，唯愿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能写出点至少自觉还称得上艺术的东西。但，如果终究不行，那么，除了承认自己的平庸，我们将一无遗憾！”

我无法形容当时自己的感受，但却清楚地记得其中含着一丝悲酸。

也许真是天道酬勤吧，从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们的习作陆续和读者见面，尽管稚嫩，尽管粗糙，但毕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

每当看到林帆有作品问世，我都会在日记里记录下自己的欣喜，有时还要用红色，而他也吝啬笔墨地在信中表达对我的鼓励：“今年，你的战果还算辉煌。我以此引为骄傲。在艰难崎岖之中苦斗的我们，除了友情，还有比这更能给人以安慰的么？”

不愉快也是有过的。为了他《老枣树》中一个用词，诗人曾经毫不掩饰心中的烦躁：“要是让语言学家严厉地解剖起任何一篇文章来，恐怕连堪称语言大师的名家们有时也很难摆脱异常尴尬的困境。日乾，您是否有些太严峻了？”——老实说，问题出在我一边，但并非“严峻”。我于诗毕竟有些“隔”，有时难免依照常规品评灵动跳脱的诗的语言，可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切磋琢磨，友情道义。

他希望：评论中，您无妨掺入作为挚友的体验和感情，但要客观，不溢美、不藏拙，这对我的进步帮助会更大。我的脾气容不得我任意抬高，也没本事“吹”花乱坠，但也不必讳言，对风雨同行的朋友真正的佳作我亦难免偏爱，倾注深情。熟悉的读者会注意到，《乡情与诗美》（《延河》1983年4月号）已用铅字把马林帆和冯日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；虽然没有谁知道，《高天厚土 大笔浓情》（《西安晚报》1984年9月16日）是我用饱蘸感情的笔尖挑起沉重的病体苦战三天三夜草成的，但明眼人或许已经读出：在关中这块“先秦散文一样精严，大唐诗歌一样辉煌，风酒一样醇绵、板胡一样粗犷的热土”上，一起成长的两位底层作者，此后将会结下终生不解的翰墨情缘。

1986年，省广播电台文艺部选中了林帆的力作《啊！我的关中》，要他约请一位对自己熟悉的论者写篇文笔优美的诗评，同时配乐播出。林帆毫不犹豫地呈交了我的《高天厚土 大笔浓情》。我想，他注重的是朋友的相知和真情。

从1956年火车上的执手初叙，到省电台为二人架起诗、评相应的虹桥，一路走来，花落花开三十年。

流光无情，把我们催逼到2016年深秋。文艺路上相遇，寒暄之后，你突然想到什么似的问：“闲时，还弹琴吗？”并且做出一个右手持弓的动作。

我苦笑，摇头。“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！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诚然，我们都老了，但你的思维仍那么清晰，反应敏捷。谁想得到，两月之后你竟悄然西归，不打一声招呼。

惊闻后，又是一个星霜三十度的轮回。

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！”

写于诗人马林帆逝世三周年 □冯日乾

# “倒流壶”中乾坤大

### 钩沉

《平凡的世界》是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，也是陕西省作家最早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著作。《平凡的世界》这个书名大气、厚重、不张扬，再配上题记“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”，引发了作者和读者的反复琢磨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这个书名是怎样来的呢？1983年春夏之间，路遥下决心向长篇小说进军，开启了《平凡的世界》创作的准备工作。1983年底，路遥在与挚友、作家海波的一次交流中，得知其正在构思一部《走向大世界》的长篇小说，认为海波构思的小说叫《走向大世界》不合适，而自己正准备创作的反映1975年之后，中国城乡社会近十年间变迁的史诗性小说的主旨，更适合叫《走向大世界》。路遥还初定这部小说的框架是三部、六卷，一百万字，甚至给小说的三部分别取名《黄土》《黑金》《大城市》。

当然，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在1986年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时，并未叫《走向大世界》，而以《平凡的世界》为名出版。原来，路遥在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中，又认为《走向大世界》这个书名太张扬，甚至有点像著作的名称。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在《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》中写道：“后来的书名（指《平凡的世界》）是作家和谷，还有诗人页页改的，我已记不清了，但肯定是他俩其中一个给改的。”

和谷是国家一级作家、陕西省作协顾问，他曾回忆说：“有关《平凡的世界》的书名，路遥可能也征询过别的朋友的意见，但我清楚记得，有一次去路遥家，谈到这部小说的书名，由于其在读秘作作家西罗阿莱格里的《广漠的世界》，我建议路遥把小说改名为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路遥说好。”

和谷与路遥早在1973年就认识，是很好的朋友。和谷先后写过《路遥的脚夫调》《路遥与烟》和《追思路遥》等文章。和谷任《长安》主编时，在《长安》百周年纪念号101-102期头条刊发了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三部的章节。 □付海贤

凰、兽之王狮子、花之王牡丹)的灵气、霸气、美艳于一身，“巧如范金，精比琢玉”，实乃耀州窑瓷器出类拔萃的珍品。1968年，陕西省彬县县城的一个农民无意中挖出一个瓷壶。1982年，他的亲戚高立勋回乡探亲时，见到了这件古色古香，刻有精美花纹的瓷壶，觉得它大有来历，就送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。后来经过专家鉴定，当时确认这是北宋时期的成品，并根据壶身所绘的罕见的凤凰纹饰，认定它是一件贡品。至今这件刻花青瓷倒流壶是发现的唯一一件耀州青瓷绝品。至于它怎么会流落民间，埋藏地下，时至今日，还是个未解之谜，无人知晓其中的玄机。

当时，专家们认定此壶为国宝级文物，却一度为其如何灌装酒或茶水而迷惑。这个精美的器物，如果是一个壶，无论是用来盛水还是用来盛酒，总应该有一个入口。可此壶虽然有“盖”，但壶盖与壶身为一体，根本无法打开。在壶的底座有一个除壶嘴外唯一能进入壶内部的通道。于是专家试着将水顺着梅花孔注入壶内，这时水并没有从壶嘴流出来。令专家没有想到的是：将壶身正过来以后，水也并没有

从壶底的梅花孔流出来，如果此时将壶身轻轻倾斜，水反而能从壶嘴正常的流出。这是一只什么壶？在这只神秘的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“暗道机关”呢？为了解开此壶的秘密，专家们对此壶进行了X光“透视”。于是，他们领略了古人的智慧，感知了先人的伟大。通过此壶的剖面图，专家看到壶里面有两个导管，由此可以判断出，此壶实际上是一只倒流壶。倒流壶是一种可以把液体从壶底注入，并从壶嘴正常倒出的壶，是依据物理学中的“连通器液面等高”的原理做成的。这个原理是：连通器中只有一种液体，且液体不流动时，各容器中的液面总保持相平。

因此，此壶之所以没有可以掀开的壶盖，却在壶底留有一个神秘梅花孔洞的谜团迎刃而解了。可是早在二千多年前，古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制作出倒流壶的呢？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和现场示范，原来倒流壶在制作过程中也是要用“倒”着制作。需要先用陶泥拉出壶形，再将准备好的导管放进壶胎内部，然后再将成

型壶口封上，进炉烧制。由于倒流壶没有可掀开的盖，因此比起生活中我们常用的壶，密封得更严实，灰尘不落入壶内，也就更卫生。好多外国人在参观了倒流壶后钦佩地说：“一千多年前，你们老祖先就知道密封和讲卫生，真了不起。”其实，倒流壶的“玄机”并不完全在这里，它的出现，展示了古人在陶瓷作品的设计、制造、烧制各个环节上具有的先进工艺和高超水平。耀州窑创烧于隋唐，北宋时期达到鼎盛，明清后走向没落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为了响应国家恢复全国各大名窑生产的指示，耀州刻花青瓷才逐步开始恢复生产。 □雷焕



倒流壶剖面图



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：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

在陕西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有着1400年历史的耀州窑算得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其烧制的“青釉剔花倒流壶”（也称“倒流壶”）是耀州窑的代表。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“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”是国家一级文物，镇馆之宝之一。此壶高18.3cm，腹径14.3cm，腹深12cm，底径7.5cm，通体施以橄榄青色釉，釉下刻有装饰效果强烈的刻花图案。伏凤式提梁，以花蒂象征壶盖。盖、壶衔接处堆塑哺乳狮子，母狮张口为流（出水的壶嘴），母子狮的神态刻画得细致入微、栩栩如生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球形壶腹刻饰缠枝牡丹。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，它集“三王”（鸟之王凤